

陈超 编



中国当代诗选

上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诗选

中国当代诗选

中国当代诗选



上卷

陈超 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A

中国当代诗选

(上、下卷)

陈超 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邢台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1/32 37.375 印张 585 千字 1999 年 1 月 1 版

1999 年 1 月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63.50 元

ISBN 7-5434-3307-9/I·396

致 读 者

《中国当代诗选》是我国迄今出版的跨年代最长的一部当代诗集。选收了建国以来我国(包括台湾在内)一百五十余位优秀诗人创作的六百余篇诗作。这些作品都是编者做了严格的甄别、淘汰工作后慎重筛选出来的,无论在表现我国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方面,还是诗人个人特定发展阶段的思想、艺术倾向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作品汇于一卷,可以概括地反映出四十余年来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主要脉流和步态。

由于历史上特定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原因,本书中选收的“文革”及其前时期的诗作所占篇幅较小,而新时期以来的诗作——包括“归来者”、“朦胧诗”、“新生代”等诗群的诗作——占了较大比例。

本书所收的诗歌在排序上没有采用常见的编

年史式的方法,而是以诗人个人为单位辑排。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选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读者能对诗人创作的总体构成获得较清晰的认识。此外还要说明的是,任何诗人的创作生涯,大抵都经历过一个从探索走向成熟的过程。而本书选收的,并非都是诗人后期的成熟作品。这可能有违诗人的本愿,但其间的意义,我们相信他们会理解的。关于这一点,本书编者陈超先生已在序言中做了十分深刻的阐释。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选集”都不可能是精当到无以复加的“完本”。本书自然也不例外——诗海茫茫,佳作如林,编者虽已尽了最大努力,但“遗珠之憾”终究是难免的。恳望我们的诗人和读者谅解。好在我们还可以在日后修订此书,使之渐臻完善。

藉此向本书读者致意。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陈 超

序

一

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它以挣脱日趋衰微的古典诗歌精神为肇始，很快导入葱俊进取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和“启蒙”色彩的激情调性中。民主、科学、自由、人性，这些与现代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精神处境，更新了一代人的审美情感。但随着时代激烈的升沉，这种“启蒙”意义上的精神中枢，被更迫切的民族“救亡”使命取代。在民族战争的烽烟中，诗歌充任了悲郁的吹号者的角色。直到四十年代初，中国新诗主流逐步悬置了

抒情主体的“个人话语”视域，确立了自身民众代言人的特征。

从1949年开始的当代诗歌，就在以上的背景中展开。新中国的诞生，要求着诗歌与新的时代精神直接呼应。当时活跃的诗人，大部分是来自解放区的战士诗人。当这些诗人为之战斗呼号的人民共和国像朝阳一样从东方升起，他们的全部感情几乎都被这划时代的巨变所统摄，他们感到的只有阳光、鲜花、沸腾的建设工程和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喜悦。新生活、新时代、新的民众情感是这些诗人赖以创造的主要契机。因此，“放声歌唱”成为五十年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母题。这种歌唱，发自诗人内心，有着历史的必然性，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精神风貌，但它也同时播下了局限的种子。其一是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被看作灰暗的疏离时代的“自我表现”，致使一大批在思想、艺术上准备更充分、更自觉的诗人被迫停止了写作，如四十年代为中国新诗的实质性进展作出贡献的“九叶诗群”。其二是诗歌的本体依据发生了巨大的扭曲。这一最具“表现”特征的语言艺术，被用来直接粗鄙地“反映”、“追踪”生活。而这里的生活又仅仅被单向度地规定为时效性的“政治生活”。其三是诗人们一味沉浸于“歌颂”，忽略和淡忘了我们的新时代是从封建极权的污淖中刚刚挣脱出来，它潜

含着的巨大隐患和强烈势能仍然是我们面临的噬心威胁。对胡风以及“七月诗群”的残酷扼制，包括在稍后的反右扩大化中许多诗人横遭舛运，都昭示我们，狂暴的政治运动的压力，简单化、教条主义式的批判，从源头上直接产生于封建主义的残污，仅仅“放声歌唱”是不够的。

进入六十年代，诗歌的发展呈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许多诗人仍然固持于简单的颂歌调性，又加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写出一大批颂歌加战歌的诗章；另一方面，是少数诗人面对了浮泛颂歌和应时战歌的沉痛后果，在被各种卡子卡得变了形的才华中，表达了一个诗人生命深处隐隐跃动的良知。他们虽然也倾向于战歌调性，但深入细辨，我们会发现这些诗的用力之处似在揭示生活的艰辛和时代发展的沉重感。可惜，这种诗歌精神的微小转型，很快就被“文化大革命”这一浩劫中断。

“文革”十年，真正的诗歌被推下悬崖。公开发表的诗，大抵已沦为畸形政治的传声筒或阴谋邀宠的工具，更无艺术性可言。但中国诗歌的火种并没有泯灭，优秀的诗人虽然处于“地下”创作状态，却为我们留下了更为珍贵的悲郁凝重之作。牛汉、曾卓、穆旦、绿原、郭小川、流沙河、食指、北岛、芒克等一批诗人形成的三代诗人“梯队”，为我们展

示出这一时代更为激动人心的诗歌景观。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论及。

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是一次社会学意义上的诗歌强爆发。它为文化专制的崩溃埋下了军火，它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和艺术的大面积解放，举行了庄严的奠基礼。

新时期开始后，诗歌创作首先恢复了“说真话”这一现实主义精神传统。一大批被称为“归来者”的诗人，带着残烈的伤痕，直陈了作为“种族触角”的诗人的社会使命感和浩然正气。他们的话语方式仍然定位于国家、集团之中。对艺术社会功利的强调，使诗人和人民一道开始深刻的反思，产生出一批针砭时弊和呼唤科学、民主的诗篇。这些诗作的特点是深深的忧患感，个人命运的苦难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诗歌在美学上的选择紧紧依附于一个公民的社会职责。他们在“归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诗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公众话语立场的“归来”。因此，这些诗在诗性的觉悟上，在诗歌本体依据的追复和重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留下了历史中断必然带来的遗憾。此为“归来者”诗潮的初期面貌。

几乎同时大面积展开的是另一种被称作“朦胧诗”的诗歌现象。“朦胧诗”与“归来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朦胧诗”衔接的不是被中断的现实主义

诗歌(但并非没有现实主义精神),从创造力型态上,它更倾心于对现代主义诗歌的亲。虽然它的早期作品留有浪漫主义的尾巴,但很快就开始诗学向度的现代转型。他们由对局部是非本质及具体意识形态的批判,扩展为对人类异化生存的广泛探究;由青春期燃灼的良知歌唱,导入现代史诗性的对“生存——文化——语言”的综合处理;由集团意识的呼告式表达,转入个人话语的“表现自我”。总之,“朦胧诗”的出现,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关键的精神事件。它的贡献是:第一,个体主体性在诗中得到竖立;第二,对诗歌肌质的进一步强调;第三,对跨文化语境西方现代诗的倾心关注,由仿写到创造。至此,中国新诗得以在另一种开阔的意识维度上发展,并开始中国新诗呼应世界诗歌总背景的努力。

1984年之后,“新生代”诗人成为诗坛新锐。作为诗歌发展持续性岩层的新断面,他们体现出自己的质素,以及摆脱“朦胧诗”影响的努力。随着红色选本文化的崩溃,和翻译界“日日新”的出版速度,这些更年轻的诗人,亲睹了一个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文化景观。在意识背景上,他们中的一翼更趋向个人自由、感性动力、精神超越;另一翼则趋向现代理性、终极关怀、承担、神性。新生代诗人这一指称,作为“朦胧诗”之后先锋诗歌的泛指,

其内部更为向度纷繁,彼此盘诘、纠葛。但宏观上考察,有两点是非常显豁的特征:其一,在大的意识背景上,他们都强调个体生命体验高于任何形式的集体精神顺役;其二,在语言态度上,他们完成了语言在诗歌中目的性的转换。语言不再是单纯的意义容器,而是诗人生命体验中唯一的事实。

总之,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国诗歌,不仅是青年诗人,同时也包括众多的中老年诗人,都共同体现出程度不同的现代诗性自觉。这种自觉既是诗歌本体依据和古老尊严的恢复和发展,也是抒情主体个人定位的最终确立。这两点,是中国当代诗歌经由痛苦的磨砺、甚至付出鲜血的代价换来的,是“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语)。我以为,它同时也将是今后诗歌发展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可靠保证。

当我们粗略回顾了当代中国诗歌精神的运行大势后,我们既感到欣慰又感到沉重的怅惘。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下,我更感到编选一部跨年代最长的《中国当代诗选》(1949——1994)的必要。的确,历史无可避讳。对我们而言,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对既往诗歌历史负责的态度不是简单的责难,而是对其时其地的语境进行冷静的反思、批判、剥离、包容后超越。没有在文本上被深刻理解、省察

过的诗歌历史，决不是真正有效的诗歌历史。这是我编选此书的根本动机。

二

如果我们对“诗选”一词特殊凝视，就会发现，从语源上它的名词意义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除了表明它是某一类出版物外，它昭示的意义不会更多。但是，只要我们深入细辨，“诗选”一词的动词性质就严肃或严重得多：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方式，是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而对过往年代的诗歌文本进行严苛的评估、淘汰。它是“诗”选，而不是其他——这时，我们所要考虑的，不仅是它关涉到的史纂学意义上的“真实性”，还同时要考虑它在诗学意义上的本体规范和价值尺度。

在编选这部迄今为止跨年代最长的《中国当代诗选》时，我所依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如上所说的“本体依据”和历史“真实性”。它既是历时的追溯、省察，也是共时的诗学判断力的调动。我的意图，当不仅仅在于描绘一幅种族诗歌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图景；更重要的是想经由各不同时期，诗歌精神大势和话语方式的嬗变，来揭示出与诗歌本体自身相关的信念：诗就是诗。“诗”之“选”将据此迫使自身接受这一信念的检验。

基于如上考虑，我应邀编选了《中国当代诗选》。否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和兴致来承担这项沉重的工作。

本诗选没有采用常见的编年史的方式，而是以诗人个人为单位进行甄选。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诗歌乃是个体生命和语言的双重洞开，是个体生命与语言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之间相互摩擦、盘诘的渐次深入。在细读了诗人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作品之后，我的目的是展示这一个个体生命如何一步步发现和确立自身的。虽然由于各种复杂情势——特别是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偏执所带来的诗性扭曲——使诗人（特别是一些中、老年诗人）前后期的创作水准呈现出明显的反差，但我仍然注意了或者说正视了这种反差的“意义”。在收选作品时，既收选早期名作，也收选后期名作，以求给读者提供“个体生命精神成长史”的线索。从诗末签署的写作时间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可惜的是，一些诗人没有在诗末签署写作时间的习惯，我只好按诗歌文本出现的时间来大略排定前后期顺序。作为诗学研究者，我当然有自己的审美价值尺度，但我想也不能过分固持于此。作为一部众人之书的选编者，我还应对历史负责。但对诗歌本体依据的追问、评估，是我种种灵活性中的稳定性，也是我考察诗人不同创造力型态构成的

种种相对性之中的绝对价值指向。因此，“史”和“诗”这两端交替运行在我选编过程中。其实，这也是任何一位严肃的选编者应尽的“天职”。

为弥补选编者目力的局囿，我在通读了能够找到的近四百种诗集（个人专集）、六十种诗歌年编和建国以来的重要文学刊物的基础上，还向能够联系到的在大陆的重要诗人发函索稿。这些函件大部分得到回应。在此，我对这些前辈和朋友提供的帮助致以衷心感谢。但是，我想坦率地昭明，正像我在索稿函中所说的，这些诗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材料”或“基础”，同样重要的是诗人与选家面对文本所发生的碰撞、质询、相互的激活和“发现”。缘于这一动机，而不是任何自矜，我在较大的程度上没有尊重作者的意见。因为，诗人们秉有的超越天性，使得“悔其少作”作为一种感人美德的同时，也威胁到了这部诗选的初衷之一：对“个体生命精神成长史”的揭示。这毕竟不单是一部“近作选”。而这种精神，也正是河北教育出版社面对历时四十余年的当代诗歌历程，所体现的广阔胸怀和美意。

编讫这部《中国当代诗选》，对我而言，有如在精神履历上涉过了共和国的激情和沧桑。尽管我们的诗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过种种迂回升沉，但总体考察，它是前进的一颗巨大的“立体的

冒烟燃烧的良心”(帕斯捷尔纳克语)。在这里,我特别想说明的一点是,许多文学史著作认为“文革十年”没有诗歌,不,我要说恰恰是这文化专制空前严酷的十年,在我们的祖国,产生了一大批堪称具有种族“心史”意义的“地下”写作。从牛汉、曾卓、穆旦、绿原、郭小川、流沙河等老诗人的泣血写作,到更为年轻的诗人食指、北岛、芒克、舒婷、多多等的地火燃灼般的怀疑和挑战,都共同昭示了中国诗歌圣洁犀利的火种不曾泯灭!本诗选着意考虑了这一点,这也是它与另外某些选本相比,体现的不同之处。

作为一部力图全面的中国当代诗歌选本,本书以一定的篇幅收选了台湾重要诗人的佳作。台湾诗歌的审美流向,与大陆新时期以来诗歌的审美流向有诸多相似之处。大体说来,可分为现代主义流向和新古典主义流向。前者以纪弦、商禽、羊令野、罗门、郑愁予(《现代诗》同仁)、痖弦、洛夫、叶维廉(《创世纪》重要代表)等诗人为主要代表;后者以覃子豪、余光中、周梦蝶、钟鼎文(“蓝星诗社”成员)、白荻、蒋勋、吴晟(《笠》诗刊同仁)等诗人为主要代表。现代主义诗歌流向,从哲学背景上旋转于存在主义的指代范畴,从个人方式上接近于后期象征派及超现实主义。而新古典主义诗歌流向,拒斥艰深的智性,讲究中国传统风神的独抒

性灵，追求诗歌完整的意境和天地同参的“韵味”。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此二种流向渐呈交汇之势，洛夫的诗作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征。这本诗选，收入了以上四个诗歌社团主要成员不同时期的作品，尤其侧重于诗人后期创作。陈明这一点，一个目的是想展示跨意识形态语境的诗人，对民族古老磁心的共同趋近；另一个目的是想坦告读者，如果此诗选能有修订版本的机会，我将用更完备的资料来进一步补充台湾新生代诗人的作品，以弥补此诗选在这方面资料的不足。

这是一部既有诗人早期佳作又有其最新代表作的诗歌选本。我不敢说我自身的审美素质能使这部诗集是“好的”，但我想或许可以说它是“重要”的。如果它的出版，能给读者和专业的诗学研究人员提供一份有用的诗人精神“档案”，能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诗歌精神大势有一个大致的把握，我将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借本书出版的机会，我谨向著名诗人牛汉和著名诗学家谢冕教授表达我诚挚的感谢。要是没有他们的鼓励、支持和建议，我是没有能力和勇气来完成这一项浩杂而沉重的工作的。我还要向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等单位致以谢忱，感谢他们